

笔谈

荣剑  
郝志东  
王大卫  
吴强  
张崑  
冯崇义  
胡平

# 中国的左右 之争在争什 么？

编按：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在多党制国家，根据选举制度、传统、选民利益和观念等形成不同光谱的、动态的左右派别。但中国的左右之争却经常出现语境误植、概念不清的混乱。厘清左右之争背后的真问题，对中国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的左右之争在争什么？与欧美的左右之争有何相同与不同？是否存在“问题殖民”，从而讨论的问题和中国现实脱节？政府越少、福利越小越好吗？自由和平等之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市场竞争与社会福利之间能否平衡，如何平衡？当今中国政权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还是兼而有之？中国的现实是太“左”了还是太“右”了？中国有左翼自由主义吗？中国悬殊的贫富差距对未来的民主转型和稳定会有什么影响？

“左”和“右”的定义是否一成不变，又如何变化？在没有宪政制度的情况下，左右之争还有意义吗？是否可能超越左右，应否以及如何超越？如果我们不仅关心观念的辨析，也关心中国的民主前景和人民的福祉，如何看待与左右光谱有关的形形色色的派系——自由至上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进步主义、新自由主义 (Neoliberalism)、社会自由主义 (Social Liberalism)、新左派、新权威主义、民粹主义、保守主义？

《中国民主季刊》特邀部分专家学者，进行了以下笔谈。参与笔谈的包括左右不同立场的作者。本刊作为一个公共平台，致力于增进不同观点的相互了解、交流与交锋，欢迎持不同看法的学人赐稿。



**荣剑 (中国大陆独立政治学者)：**韩寒曾有一个著名的说法：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个叫逻辑，一个叫中国逻辑。中国逻辑实际上就是不讲逻辑。同理，世界上有两种左派，

一个叫左派，一个叫中国左派，中国左派实际上不是左派。

欧洲左派自法国大革命诞生以来已有两百余年的历史，按照雷蒙·阿隆的说法，左派从来没有固定不变的主题，但左派的核心价值观始终没有变，那就是为实现平等而展开各种各样的斗争，从阶级平等到目前广为流行的种族平等、性别平等和跨性别平等。

中国左派在其形成的最初时期（从康有为大同书至五四），与欧洲左派具有相同的价值诉求。到了“左翼十年”（1928-1937年），左翼运动深受中共思想影响，两者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理解——建设一个平等的社会，形成了中共领导下的左翼运动。后来在国共两党之间形成的“第三方势力”即所谓民主党派，多数属于左派，他们因为主张平等的价值观而选择与中共同盟。到了延安时期，以“延安整风”为标志，中共开始了对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洗脑），至中共建政之后，思想改造运动愈演愈烈，在1957年达到了一个高潮，原来的左派统统被打入“右派”行列。

由此使左派的标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凡是赞成、支持中共政权的人，都是左派；凡是批评、质疑中共政权的人，都是右派。中共语境中的左右之争，成了正确与错误、先进与反动之争。

对于中共历史上发生的三次所谓“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分别以李立三、瞿秋白、王明为代表），中共从来都是将“左倾”打上引号（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提出“主要是反‘左’，同样也是把左打上引号”），以表示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并不是真正的左派，实质是右派。为左派打上引号，是斯大林在论述联共（布）党史时提出来的——“我们列宁主义者

在自己的党内是唯一不带引号的左派”，这一说法被中共延续至今，从未改变。中共尽管一直主张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但从1957年“反右”斗争以来，中共基本上不提反“左”。只许反右，不许反左，成为中共党内的一条定律（参阅林蕴晖的相关著述）。史华慈对中共革命多有肯定，惟独认为毛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极左错误。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一个极左的理论，后来亦在中共的历史决议中被认可，反“极左”成了文革后的时代主题。

由于中共把党外的左派（从左翼人士到民主党派）和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统统打入了右派行列，同时又因为中共的极左路线成为祸国殃民的主要思想根源，因此，文革结束以后开展的思想解放运动很快形成了反左的思想氛围。在此思想氛围里，没有人愿意称自己是左派，左派在学术和道德上都没有合法性。

1990年代提出“新左派”这个概念时，汪晖不愿戴上这顶帽子，而自称是“批判的知识分子”。随着欧美左翼思想的广泛引进，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民间人士开始对左派去污名化，愿意自称左派，由此形成了中国左派的三大阵营：党内的老左（以邓力群等为代表），民间的毛左（以张宏良等为代表），学界的新左（以汪晖等为代表）。老左和毛左在理论上泛善可陈。新左在理论构成上涵盖了三个国际：第一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第三国际的列宁斯大林主义，同时，对毛的理论进行重新阐释，充分借鉴欧美左翼思想，广泛运用各种后学理论。

新左理论庞杂宏大，在“三观”上与欧美左翼有许多交集，汪晖在欧洲多次获大奖，是欧洲左翼对其理论认可的证明。但欧洲左翼没有充分意识到

的是，中国新左派已经全面转向对国家主义的支持，其反对西方现代性的一系列理论表述已经转化为反对西方宪政民主制度及其价值观的立场，中国新左派已经完全背离了欧洲左翼一贯坚持的价值观，堕落为国家主义的附庸。中国语境里的左右之争的实质，用我曾经批评汪晖的话来说：中国新左派的政治立场不仅远离右翼一贯倡导的自由宪政理念，而且也和左翼始终坚守的政治民主立场相去甚远。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基于左翼或右翼的立场与中国新左派的理论之争，绝不可能是左右之争，而只能是文野之争，即文明和野蛮之争。



郝志东（澳门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用左右来划分中国知识分子及其思潮的确容易让人感到困惑。我认为用国家主义和民主主义倾向来分析他们及他们的思想可以让我们把问题看得更清晰一些。

我在《十字路口的知识分子》一书中讨论了1990年代的知识分子及其思潮，比如那些参与了《东方》杂志文章的撰写、参与了人文精神大讨论、后现代大讨论、参与了民主运动的人，不少都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而萧功秦、王沪宁则代表了新保守主义或者说威权主义；韩毓海、崔之元等对市场经济的批判代表了新左派；《中流》、《当代思潮》、《真理的追求》等杂志则代表着老左派；《中国可以说不》、《北京人在纽约》等则代表着中华民族主义与反西方主义。

这些思潮在30年后的今天仍然存在。但是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我们很难将其做简单的左右之分。如果强分，就有很多说不清楚的地方，比如萧功秦是左还是右就很难说清楚。但是，如果我们用国家主义与民主主义来区分

当今不同的思潮与人物，就既能把他（它）们看得比较清楚，也能把他（它）们的复杂性显示出来。

国家主义以国家的强盛为其核心目标，而民主主义则是以实现民主、人权、公民社会等普世价值为核心目标。国家主义知识分子，或者说有国家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可以包括强调国家控制的王绍光、胡鞍钢（后者还和胡联合博士共同提出了同化少数民族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强调党国一体的汪晖；宣扬中国模式的潘维、张维为；信仰施密特主义的强世功；宣传香港“二次回归”的郑永年；主张由中央全面管制香港的陈端洪和田飞龙；认为消灭几万台军就可以轻易解决台湾问题的金灿荣；要求在民族问题上“去政治化”的马戎等等。其实所有那些做国家课题的社会科学知识分子们其实多多少少都是国家主义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课题的宗旨多是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强化国家对社会的管控。这里可以说包括了大部分的人文社科知识分子，而且包括那些在现代技术上使有效管制成为可能的科技知识分子。

主张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其实应该不在少数，但是在当今的中国，这些人一旦露头就会被打下去，比如许章润、许志永、任志强以及那些人权律师。他们要不丢掉公职，要不身陷囹圄。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如贺卫方、张千帆、资中筠等谨言慎行，尽量争取不惹祸上身。在民族问题上，少数民族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已经基本不能说话了。另外一些少数民族和汉族知识分子前些年还在呼吁在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候要大力尊重少数民族的利益，比如郝时远、宝力格、纳日碧力戈、金炳镐等等。但是除了在海外的宝力格之外，他们现在也都谨言慎行了。在海外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尽管言论尺度可以稍微宽一点，但是多数情况下对国内的民主运动却爱莫能助。用江泽民1990年代评价海外

民运的话说，是“不成气候，不足为患”。

另外在海内外原本主张民主主义的一些知识分子们“一夜之间”开始反对主张人人平等的所谓“白左”、坚定支持破坏民主的川普，使人们怀疑他们到底是否民主主义的支持者。在这个问题上，萧功秦、孙立平、郭于华、刘军宁、曹长青、廖亦武、何清涟、李南央、陈破空、李劫、艾未未、余杰等等最为典型。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或许那些国家主义的知识分子并不一定是时时处处都是国家主义的信徒，比如马戎、萧功秦。而那些民主主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并不是时时处处都是民主主义的信徒，比如上面这些其他人物。如果我们想对他们有所了解，就需要具体事情具体分析了。但是相对于左右而言，用国家主义和民主主义来检验他们，还是可以比较容易地让人们看清楚他们或许是在经常变化着的面孔。

**王大卫（笔名，中国大陆政治学者、教授）：**中共特色的左右概念与宪政民主国家的左右概念，在形式上是有重大区别，而在精神实质上是完全相反的：

- 1、中共国是非左即右的两分法，宪政民主国家是极右、中右、中左、极左四分法。
- 2、中共国的左和右是走向两极、绝对对立的，宪政民主国家的左和右，正常情况下是向对方靠拢达成最低共识的。
- 3、中共国的左和右都以自己为绝对正确而以对方为绝对错误，因此必然出现极权专制逻辑；宪政民主国家正常情况下左右各派都不敢极端化和绝对化，因此必然出现以中左和中右轮替为主轴、极左和极右也必须遵守的宪

政民主逻辑。

严重问题之一：中国的反共者也跟中共一样持左右两分法，只不过中共以左自居、以左为荣，而视反对者为右、为敌，而反共者则以右自居、以右为荣，而视中共为左、为敌。不言而喻，既然只有绝对对立的双方，左右两方也就是极左和极右了。前者是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者可称之为中国特色自由主义，两者遵循同样极端化的政治逻辑。中共作恶在先，反对者占有道义优势，但其极右主义与其所反对的极左主义，在政治发展方向上，在政治哲学和政治学上，是同态和等价的，并无优劣对错之分。

严重问题之二：错判中共性质的变化。从国际标准来看，极左只是现在的中共的一张画皮和忽悠底层民众的谎言，其真正的性质是极右，是暴力基因+红色血统等级专制+权贵官僚资本+高科技奴隶制，是人类历史上罕见强大的极右专制。对于这种形式的极权主义，仅以自由之名是颠覆不了的，并须同时以自由、平等、正义之名号召和组织民众才能予以颠覆。

严重问题之三：在两分法框架内，只有极右和极左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国内已经出现的主张自由优先兼顾平等的中右与主张平等优先兼顾自由的中左，则无处安放，而中右和中左恰好是摧毁极权专制制度的主要力量，仅靠一小撮极右自由派不仅颠覆不了中共的统治，即使颠覆了，也不过是换一拨人来搞极右专制而已。

严重问题之四：无法与国际主流政治文明和政治社会对接，无法取得国际自由民主力量的帮助。典型的例子就是大量极右反共者，以中国自由民主派之名，诋毁欧美中左人士为“白左”、“圣母婊”、“共产主义者”，沦为可



耻的川（川普）粉和普（普京）粉，其言行危害到了欧美左右制衡与轮替的宪政民主制度。

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引进国际主流的左右四分法。其实，在历史上，一旦出现以左右划分政治思想和行为，就已经有极右、中右、中左、极左之分了，在英国、美国、法国革命中都可以找到这四派的踪影。原因在于，在等级专制制度下，实际上只有上下之分，并无左右之分，左右之分是随着自由市场经济、横向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展开而出现的，在这种水平面上，出现四分、六分、八分以至更多划分都是正常的。实际上，民国时期四分法已经出现了：国粹主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是极右，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是中右，社会民主主义是中左，共产主义是极左。中共在消灭了右边的一切政治力量之后，实际上已经取消了左右划分，而恢复了上下划分。如果还要继续套用左右概念的话，它就是一个集极左和极右于一身的超级利维坦或



极权主义怪兽，它继续沿用左右概念来制造、打击和消灭敌人，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怎么能够上它这个当呢？

**吴强（独立政治学学者，前清华大学讲师）：**在过去二十年，在反恐战争兴起的背景下，人们目睹了从美国到中国、从俄罗斯到土耳其等地强人政治的兴起和它给世界带来的混乱。这种混乱不仅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而且在中东、阿富汗、欧洲东部和台湾海峡等地区制造了紧张和冲突，也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内部引发了极大的思想混乱，特别是部分曾经的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们转向成为这种强人政治的拥趸，站到了极端保守主义一边，令中国的自由主义在经受强人政治打压的同时，面临根本的内部危机。

造成这种危机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关键在于政治左右划分的混乱。而且，对这一认知混乱负有责任的，系来自“左右”双方的共同“努力”，如同“王车易位”一般的立场倒错，再现了一场各国现代政治史罕见的政治虚无主义，与中国当下的历史虚无主义潮流并行不悖。

最近的，是来自中国自由主义内部的认知混乱，以1990年代以来知名的自由主义者刘军宁等为代表。他们代表着过去十年中国自由主义面临失败后拥戴川普和普京的“自由派”，将历史上的极右主义的纳粹解释为“极左”，将美国的自由主义，历史上从德国的宗教自由主义（如塞姆勒，Johann Salomo Semler）演变而成、现代则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为代表并在其后与民主党紧密结合、沿袭至今的美国自由主义潮流，称之为“白左”，充分暴露了这一转向的极端保守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性质，对中产阶级追随者误导极大，也令中国的自由派与国际社会的主流政治渐行渐远。不能不说，这一来自内部的消解是何等的荒唐，在狂热的民族主义政权与国际社会逐渐脱钩的同时，也导致中国自由主义与国际自由社会的脱钩。

另一方面，如果说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镇压充分暴露了中共的极权主义的贫困，也终结了1980年代的党内自由主义的启蒙话语，而复活了起源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时代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那么相对于执政党在1990年代市场经济进程中的亲资本、反劳工、低福利的资本主义路线，是“新左派”的发展再造了中国1990年代以来的左派话语。特别以汪晖为代表，放在中国传统思想背景里重新解释中国革命和毛主义的方式获得国际左翼知识分子的认同，接续了1960年代欧洲新左派兴起之初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同时对毛主义的另类同情，在冷战后的后马克思主义兴起也是新左派的困境中，为国际新左派找到了一条难得却是隐蔽的与国家资本主

义、与全球化媾和的自救道路。然而，正是这种混杂暧昧的中国“新左派”以毛主义的幌子占据着所谓左派空间，粉饰中国的右翼政治即国家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可谓“讲好中国故事”的先驱，也为今天“形极左实极右”的“新毛主义”政治的形成做出了理论贡献。

通过上述简单梳理可以看出，中国左右的混乱乃至倒错其进路主要发生在思想领域，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空间，却对现实政治的变化和伪装缺乏基本认识，然后在事实与真实、社会与制度等维度间发生错位。具体来说，这种倒错，不仅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国家的认知出现偏差，也跟他们对劳动——工人阶级、特别是国家与劳工阶级的认知有关，而这才是过去两百年欧美政治划分左右、也是自由主义不断发展的一个关键维度。

但是，当汪晖以“去政治化”的理论包装中国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冲击整个工人阶级的巨变，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此并无任何觉察，也对1949年后按照列宁主义的工人国家建立起来的共产党政权，在1989年的彻底失败后的改革开放中悄然完成了向国家社会主义的转型同样懵懂无知，更对其后萌发的社会民主主义转型的可能无知和拒绝。例如，“三个代表理论”本身，以及中共党内改革派老人谢韬等人的自由主义的社会民主路线，接续了欧洲早期社会主义者如德国社民党人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和英国自由党人霍布豪斯(Leonard Hobhouse)所鼓吹的“真正的自由主义是为了完成而不是破坏自由主义的主要理念”。

自由派的这种懵懂，或许与他们的理论贫乏有关，或许与他们对自由主义民主化的天真想象有关，在反对中共的同时也将曾经作为中共统治联盟的劳工阶级视为敌人，最终如同他们热爱的哈耶克一样在晚年不再提起自由

主义，而是转向了所谓自由至上主义的极端保守主义，与法国大革命之后的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等一样走上了反革命、反民主、反平等、拥抱教会的反动路线，仇视革命的自由和激进的变革，不可避免地在现实政治中走向了自由主义的反面。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广义自由主义者在过去三十年轻率地将“左派”阵地让位给所谓新左派、或者新毛派、或者民族主义者，在政治上是幼稚的，在理论上也是错误的；而他们自居乃至自豪的右派地位，只因为源于中共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在1989之后转向“告别革命”，在今天则告别自由主义，只剩下种族主义、反平等、反民主的极端保守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并无区别。

重新界分左右，区分进步与保守、区分自由与非自由、区分社会与党国，也因此对于挽救中国自由主义的名声、夺回自由主义的话语权和公众支持至



关重要。这是有关保卫自由主义，也是与国家社会主义的战斗。

**张崑（旅法中国独立学者）：**左右之争本是议会政治的产物。可是当代中国并无真正的议会，在讲求“统一思想”的党国体制之下，又怎么可能允许思想上的左右之别呢？

然而，按照官方意识形态，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进而到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向、必然的发展规律；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代表进步和发达的共产主义，其对立面是代表保守和落后的资本主义。套用西方议会中右派倾向保守，左派倾向进步的一般规律，在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

阐释之下，在共产主义方向上，趋向激进的就是左派，反之是右派。在这个光谱上，改革开放以后的各种西方政治思潮，无论是追求平等的左派自由进步主义还是右派保守主义，对中共来说，因其“资本主义”的痕迹而都是“右派”思潮。

九十年代，随着党国意识形态的衰落，其对左右的解释也渐渐边缘化。“新左派”在中国舆论场上的出现，也体现出了这种新形势。来自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左、右区分方式渐渐上升为主流。在西方，几乎所有的政治思潮都源于古典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教义是国家与社会的两分：国家是社会的代表机构。议会中的左右之分，正是在社会的民意代表中产生的。在这种国家社会两分结构中，分化出了最早的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左派社会主义者主张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和经济领域，对此，右派自由主义者坚决反对。在这个基本架构之下，20世纪又衍生发展出各式各样的新思潮，甚至自由主义本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1990年代末，中国开始引入西方各种新思潮的时候，对其复杂性还来不及梳理。那时中国的左右之争还远不是西方的左右之争。此后，经过二十年的学习与消化，中国知识界渐渐跟上了世界的节奏。比如，中国“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刘军宁，最近谈的保守主义，就不再是以往英式仅仅反对法国大革命、而不反洛克的保守主义，而更接近当代美国反启蒙的新保守主义了。

只是，美国新保守主义反对的启蒙，是“苏格兰启蒙”而非“法国启蒙”，新保守主义对“苏格兰启蒙”的批评是强有力的，但是却把“法国启蒙”误以为“苏格兰启蒙”在法国的余波，导致新保守主义成了反启蒙的思潮。我的

看法是，“法国启蒙”是欧洲基督教（天主教）从中世纪开始为与异教徒辩论，沿着“信仰寻求理解”的道路采用理性语言阐释教义，而导致自身世俗化的结果。因此，基督教与欧洲启蒙运动在思想上不仅是相通的，还是高



度连贯一致的。赞成基督教反对启蒙是没有必要的。在今天，努力继承这些思想遗产，使其融入中国社会进程，或许是更重要的。

**冯崇义（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副教授）：**现代人类的左右之争，始于18世纪末的法国革命。就意识形态而言，法国革命以自由、平等、博爱为理想，以民主共和取代君主专制，指导思想本是古典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是启蒙运动的主调，推崇理性思考、个体自主和个人自由。但是，法国革命也深受卢梭所代表的法国启蒙运动左翼思想的绑架，以集体主义“公共意志”压倒个人意愿和权益。柏克1790年就出版了《反思法国大革命》一书，要求遏制法国革命中的激进主义倾向以保守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维护合乎公民和社会利益的传统制度和规范，包括个人生命权和财产权的基本道德规范，开保守主义之滥觞。在左右分野初兴的法国革命中，激进主义以及萌芽中的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左派，古典自由主义和新生的保守主义是右派。

不过，西方世界左派与右派的具体内容则在不断演变之中，而且因时因地随着坐标系的变动而大异其趣。19世纪以降，相对于声称代表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为左派，资产阶级和支持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包括主张“最小政府”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和对市场竞争走火入魔的新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是右派。

以马克思、恩格斯为开山祖的共产主义左派者，本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中分裂出来，反对和平改良路线，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9世纪末，历史发展与他们的预判和期待相反，资本主义不是走向危机而是蒸蒸日上，工人阶级不是投身革命而是告别革命，西方世界的大多数共产主义者顺应历史的大趋势而转变为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先是主张运用议会民主争取多数选票掌握国家政权以便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后来逐步放弃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目标，注重通过社会保障和福利国家来增进劳工权益。共产主义者将社会民主主义者也当成右派。

自命左派的共产主义者将法西斯主义定义为右派。其实，尽管两者不共戴天，但将他们之间的生死搏斗看作左派内斗，更符合实际。法西斯主义党国来到世间，是学习和模仿共产主义党国的产物，而且都崇拜国家主义。纳粹的全称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其极权党国与共产极权党国一样对国民经济以及整个社会实行全面控制。说共产主义者反对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也是谎言。共产主义政权打着国际主义旗号，但实际上将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合体，正像法西斯政权将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合体一样。

在中国，左派一直由中共领班。中共起源于俄共/苏共的扶植，一直以左为荣，将他们所要打击的对象都定义为右，包括地主阶级、富农阶级、资产阶级、黄色工会、国民党右派、以及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在文革浩劫中，中共更是走向极左。

还应提及新左派。斯大林之死使苏联得以从极权转为后极权，西方马列信徒陷于幻灭者众。一些人转入自由主义阵营，但更多的人在20世纪60年代

以来仍然紧抱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精力转向思想文化批判和以身份政治为底色的左翼社会运动，而且大规模进军教育界、媒体界和政界，这就是新左派的由来。新左派杂乱无章，包括新马克思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流派。他们对资本主义极尽批判之能事，却无法提供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中国新左派，一方面传承西方新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另一方面又抛弃西方左翼传统中的民主主义价值观，为中共党国专制提供国家主义理论铺垫。

更应指出，左派与右派、革命与保守的历史作用与评价，也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由于共产世界尊左，西方左派又在很大程度上操控自由世界的教育和媒体，世间话语长期将左派等同于革命、进步、解放、正义、高尚，同时贬损右派，将右派等同于反动、保守、压迫、罪过、自私。

这种左派偏见，近年来才随着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复兴而获得拨乱反正的机会。思潮变迁的现实背景是苏联等共产主义政权的崩溃和世界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自由世界获得第一次世界冷战的胜利。

纵观现代人类的历史进程，左派负面作用值得记取。法国革命的历程被柏克不幸言中，受左派支配的革命政府不仅为取悦贫民而采取一些侵夺个人财产的均贫富政策，而且在雅各宾专政中漠视公民权利，率先使用暴力施行铁血恐怖、滥杀无辜，背叛了个人权利至上的自由主义原则而陷入暴民民主、多数人暴政的集体主义狂热。此后兴起的科学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将本有偏颇的劳动价值论推到极端而鼓吹虚构的剩余价值剥削理论，将推动历史前进的劳动分工硬说成异化，将粗鄙的唯物史观和所谓辩证法规律强加于历史，妄图动员社会力量推翻奠基于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之上的资本



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民主，贻害无穷。更为严重的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而衍生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衍生毛泽东思想，这些自诩“最先进”的理论，在东方演变为权力狂和流氓无产者打家劫舍、夺权窃国的思想武器。在几十个国家建立起来的共产政权，至少杀戮一亿无辜平民，所犯的反人类罪罄竹难书。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左右之争，核心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自由民主和党国暴政之间的较量。被左派定义为右翼的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体现的正是人类在制度上的现代突破。正是这种现代突破，使人类能够取得日新月异的科技成果、创造古人无法想象的财富、使亿万普通人脱离贫困、使医疗和教育水平普遍提高、使人类获得保护生态环境的



意识和能力。而社会主义与专制政治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带来的尽是灾难。结束左祸，是人类当务之急。

**胡平（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荣誉所长）：**在中国，左右之争并非假问题，而是真问题；但它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言论自由才是。在今日中国，是争取言论自由、坚持言论自由，还是反对言论自由、漠视言论自由，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用左右之争来概括地描述这几十年中国思想界的状况，必然是把当今中国思想界的各种思想流派用左和右的标签予以分类。这就无形中假定，或者说很容易让人们误以为，被划到左派（或右派）名下的那些思想流派，它们之间的共识大于分歧，而它们和右派（或左派）之间，则是分歧大于共识。

但这显然不是事实。事实是，在划到左派（或右派）名下的思想流派中，有

的彼此高度对立，其分歧远远大于共识；相比之下，它们和某些右派（或左派）的思想反倒是共识大于分歧。质言之，无论左右，大部分思想流派都是认同言论自由的，小部分思想流派是不认同思想自由的。如果我们把前者称为自由派，自由左派和自由右派，那么，它们之间实际上是共识大于分歧，它们和后者才是分歧大于共识。

我把认同言论自由的左派和右派统称自由派。这里的自由派是取其广义。我认为，广义的自由派，或广义的自由主义，就是指个人自由——首先是言论自由——具有最高价值；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首先是不得侵犯人们的言论自由。

朱学勤对自由主义给出如下解说：“它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法政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

我这里给出的自由主义解说比朱学勤的更宽泛。在这个问题上，我赞成茱迪·史珂拉（Judith N. Shklar）。史珂拉在“恐惧的自由主义”一文里写到：“除了禁止干涉他人的自由之外，自由主义没有任何关于人们如何生活或者应该作何选择的特殊而积极的学说”。“自由主义原则上并不必依赖特殊的宗教思想体系或哲学思想体系。只要它们不拒绝宽容，就不必在它们中间进行选择”。

10年前，2013年9月，英国牛津大学召开当代中国思潮学术研讨会，邀请了自由派、新左派、新儒家和基督教研究的若干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与会，会后有28位学者达成了一份“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若干共识”，简称“2013牛津共识”。我以为这个“牛津共识”很有意义。它试图表达的就是超越左右之争、超越各种思想流派的共识，也就是我所说的广义的自由主义。

在《论言论自由》（1979）一文中，我写到：“中国人为自由民主奋斗了一百多年，为什么到头来什么都没有得到？为什么到了我们这一代还要从零开始？假如我们的前人当年就确立了自由主义的某些最简单、最根本、最起码的原则，从而奠定一块坚实的地基，让一切后来者有一方稳定的立足之地，今天的中国何以至此？“我们在这里千言万语，只是要表明一个意思：一定要实现真正的言论自由。一定要让言论自由的原则深入人心。无论人们对民主的理解还有多大分歧，无论人们对实行民主有多少审慎的顾虑，无论人们在其他方面有些什么不同的观点，在实现言论自由的这一点上，大家总是可以没有什么疑义的吧。”在《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命运》（1991）一文里，我提到过底线的意义，把言论自由当作底线或基石。

遗憾的是，三、四十年过去了，我们仍然没有争得言论自由；但唯其如此，我们还应继续争取，而争取的方式之一就是，让言论自由原则成为更多人的共识。



A4 抗议者们